

文

化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乔力 丁少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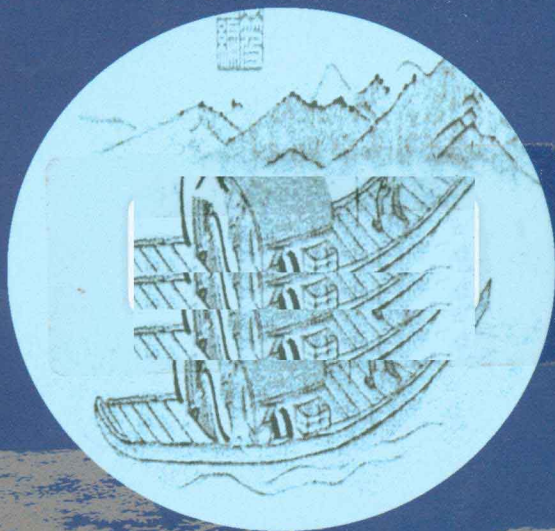


华土诗性

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

屈小强 郭新榜 / 著

济南出版社



文

化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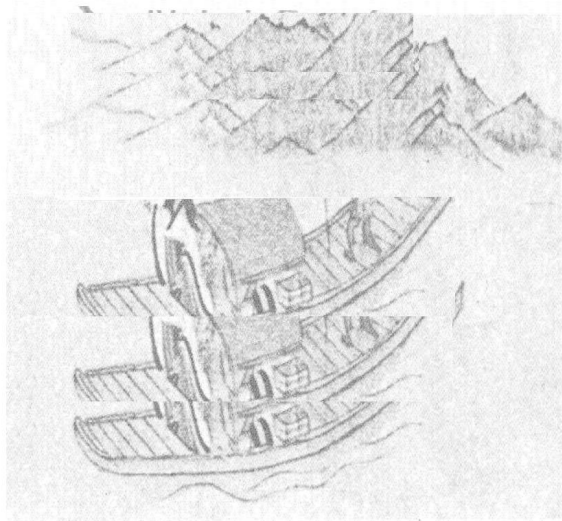
国

边缘话题

主编◎乔力 丁少伦

华土诗性

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屈小强,郭新榜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1.3

(文化中国/乔力,丁少伦主编. 边缘话题)

ISBN 978 - 7 - 5488 - 0217 - 4

I. ①华… II. ①屈… ②郭…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263 号

策 划/丁少伦

责任编辑/赵志坚 张所建

封面设计/侯文英

出版发行/济南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邮 编/250002

电 话/0531 - 86131730 86922073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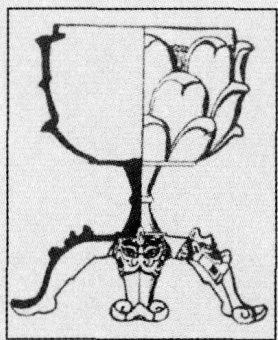
成品尺寸/168 毫米×230 毫米 1/16

印 张/14.5

字 数/181 千字

定 价/36.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0531 - 86131736)



主编人语

中国传统文化悠远深沉、丰厚博广,犹如河汉之无极。对历史文献的发掘、梳理、认知与解读,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借以丰富坚实的史料,佐以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倚以现代的思维和理性的眼光,立以历史的观照与文化的反思,将某些文化精神进行溯源与彰显,以启发读者的新审美、新思考和新认知。

何谓“文化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中国乃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旨,以传承中国文化为责任,以求提升中国民众的人文素质。而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需要新的努力;传统文化解读与现代意识反思之间的纠葛与交融,需要新的形式。正如陈从周先生在《园林美与昆曲美》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园林,以“雅”为主,“典雅”“雅趣”“雅致”“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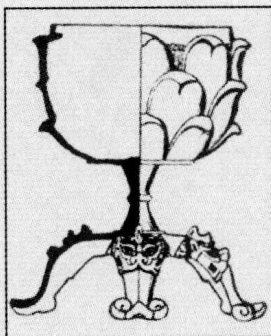
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以“雅”。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就是说,都要有文化,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欣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而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是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嘞嘞嘞”,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嘞嘞嘞”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

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而不是降格迁就,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亦如陈从周先生所言之“园林”与“昆曲”,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蕴与神韵为己任的。

何谓“边缘”?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降落民间,走向大众,体现了对大众文化和下层历史的更多观照。由此,“大历史观”下的文化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角度渐显多层次,于是,那些不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或散落在历史典籍里的,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或事,日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丰满了历史的血肉。对于这些人或事的阐述与解读,是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透视与反思的一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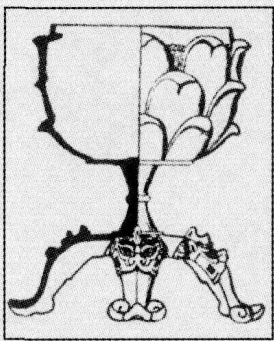
主编人语

个重要方面,其意义亦甚为厚重而深远!

何谓“话题”?《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文化解读的别样文本,讲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采用“理含事中,由事见理”的写作风格,由话入题,由题点话,以形象化、生动化的表述,生发出个人新见和一家之言。这种解说方式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绝不戏说杜撰,亦非凿空立论,正是现如今大多数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呈现出学术与趣味的统一,“虽不能至,固所愿也”!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第二辑共计五种:

文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构成之一,却又是一个极其庞杂纷繁、差异悬殊的复合体,他们广泛存在于不同阶层,并标志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人生价值取向。《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



主编人语

水文学》将文士诗人行走于山水之间、真情触摸风景的行为方式与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加以结合，贯以一千六百多年的中国山水文学史，揭示出“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性情”的审美奥妙。《山中岁月：隐士的生活与心灵轨迹》叙写的是隐士这一特殊人群的共有文化品格，即摒弃传统正统仕途的诱惑，率性而为，于山野田间实现真性情。他们归隐的动因各异，其各自的隐逸生活也各不相同。而《风流偶僦：雅士的闲情逸致与处世之道》则因事显人，在沧桑的岁月中，他们特立独行的本色气质更显超迈凡俗。他们的生活机遇、境界，乃至细微的举止和历史追想不尽的风骨情致，也折射出了某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历史上还有一类人，他们具有一种明晰的共同性，因此形成了一个群体。《梵音清韵：诗僧画侣面面谈》向我们展现了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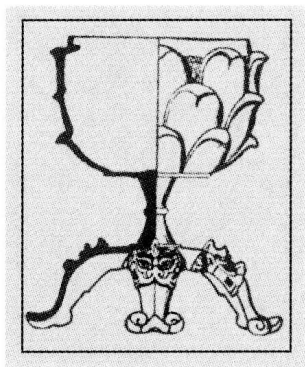
使中国艺术更加空灵、艺术使佛教更具人文底蕴的精彩图卷；同时，也探索了参禅之风对诗歌、绘画、书法、神韵情趣的熏染与影响。注目于诗僧、画僧与书僧的超脱澄澈，寻迹于他们的雅会风流、精神禅悦，从中能赏析到他们在笔墨深层充塞流溢着的狂逸之气，以及兼为艺术家的居士那僧俗两界的般若观照。

还有一种松散的群体，他们拥有着大致相通的行为特点，却难以固定和指认其社会阶层属性。在《醉卧花丛：浪子的快意与失意人生》中，有一些人，上至皇室帝王，下及落魄文士，在市井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矛盾斗争中生活，他们有着诸多怪异行径，拥有置身另类和正统之“夹缝”的特有文化性格，这些行径和性格却恰恰表现出了不可泯灭的生命价值。

诗云：“鹤鸣于阴，其子和之。鹤鸣九皋，声闻

于天。”《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浸染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渗透着对文化遗产的理想追求，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本丛

文
化
中
国
·
边
缘
话
题



主
编
人
语

书将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中国边缘文化主题的别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

二〇一一年元旦

目 录

引 言/001

山水方滋——山水文学的蔚然成宗/008

一、东临碣石有遗篇/009

二、山阴道上画中行/015

三、匡庐山水出好诗/024

四、声色大开蔚大国/035

大唐气象——唐代文士的漫游天下/053

一、孤篇横绝盖全唐/055

二、穆如清风诗如画/065

三、风神散朗清而旷/075

四、一生好入名山游/082

五、眼前有景道不得/088

六、江山英秀有兰芳/096

七、千云万水一闲士/102

八、花落花开寒山道/110

..... 两宋青山——宋代文士的山河岁月/122

一、把酒临风岳阳楼/123

二、醉翁之意不在酒/130

三、明月何时照我还/139

四、一蓑烟雨任平生/147

五、物是人非事事休/162

华土沃壤——元明清文士的山水情怀/174

一、雄篇秀句散人间/175

二、陶庵梦忆好山水/184

三、匹夫常有四海心/191

四、满溪明月浸桃花/200

五、桃花温婉可人诗/206

六、摇扇坐听清凉钟/212

主要参考书目/219

后 记/224

引言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曾有云：“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句话，可以视为中国文士山水审美活动的肇始。

人类对自然山水的依偎是与生俱来的，对山水等自然物的崇拜也出现得很早；但人类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活动，则是在自身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崛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知识阶层——士，由于对本层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开始有了认识，从而在漫游天下的活动（主要以游学之旅、游说之旅及放逐之旅的形式展开，如孔子、屈原、苏秦的漫游）中，生发出一些属于萌芽形式的山水意识，如《诗经·采薇》、屈原《九章·涉江》、《庄子·秋水》对自然风光的描述。孔子的一个得意门生曾点则直接勾画出一轴于暮春三月出游，“浴乎沂，风乎舞雩”（《论语·先进》）的人生美景，得到老师的首肯。

迨入西汉，儒学大兴，士亦振奋。董仲舒、扬雄、刘向、刘歆、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等雄姿英发，为讲学授徒、采诗制乐、著书立说而周游四方。其中尤以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为读书行路的文士代表。他们笔下的某些文赋，已在开始关注自然山水、描摹自然山水，初步具有触景生情、体物写志的面貌，为后世山水文学的形成做好了准备。

魏晋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人的理性的觉醒（即所谓“人的自觉”），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具有丰富性、互动性（即如后世李白所谓“相看两不厌”、辛弃疾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等）和层次性。自然山水已不仅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物质资源与社会教化的参照物，更是一种独



立的审美对象和交流对象。广大文士能够有余暇和精力去探奇览胜,遍游名山秀水。这不仅让他们开阔了视野,而且使其得以领略山容水态、鸟语花香,收获到与井邑都市旨趣大异的惬意和愉悦。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说:“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羊祜镇守襄阳时,“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岷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晋书·羊祜列传》)。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此外,如曹操的碣石观海,七贤的竹林放性,石崇的金谷遨游,王羲之的兰亭聚会,陶渊明的采菊东篱等,都是一时盛事,千古佳话。这时的文士,“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83页),从而开始自觉地去亲近自然,热爱自然。

古代文士悄然勃发的山水审美意识的指归之一是自然山水的道化和人格化,而魏晋以来玄学自然观的成熟则为完成这种道化和人格化起了添砖加瓦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刘宋以后,它直接表现为喜好山水、描写自然的文坛风尚。谢灵运《游名山志》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文士的山水审美意识在漫游与笔耕中趋于成型,自然山水开始真正进入人们心灵深处,形成物我圆融、相依相成的局面,以至世有不懂山水之美,便不能作文之说。(《世说新语·赏誉》载孙绰批评卫永之言:“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以山水诗歌、山水游记为核心,地理著作等为附类的具有虚静特质的山水文学终于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成熟了。一般认为,独立的山水文学的鼻祖是南朝刘宋的谢灵运。永初至元嘉前期(420—433),他的游踪遍及全境,其山水文学的创作也进入高潮,终使山水诗“由附庸蔚为大国”(钟嵘《诗品·序》)。紧随其后的漫游大家谢朓也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时人将他和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

东晋南北朝时,不独王羲之、陶渊明与大小谢是山水行走大师及诗文大

师,他如顾恺之、释慧远、鲍照、吴均、郢道元等许多著名的以及非著名文士,皆是自觉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旅行家兼山水文学家。《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典型者如王胡之游吴兴印渚山水所叹:“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晴朗。”顾恺之从会稽回来,人们问他那里山川有多美,顾氏答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不用说,这时的文士确实已从山水中获得了巨大的审美愉悦,并强烈地要把这种感受与人分享,急切地想把自然山水之美写给国人看。

不过,东晋南北朝的山水文学毕竟带有初成时期的稚嫩与狭窄。特别是从晋室南渡到宋齐梁陈的二百七十年间,朝代嬗替有如走马灯般;加之“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指晋室南渡后的北方)”(《世说新语·言语》),这便极大地限制了文士漫游天下和山水诗文创作的深层次发展。晋宋之交的陶渊明笔下景物,大半限于江西庐山一带,如上京、西庐、彭泽、柴桑。他经常走动的范围,很少超过百里。南朝山水诗人所歌咏的对象,也不过是江左数郡、东南一隅。谢灵运山水诗的视野,多在浙江的会稽、永嘉两郡;而谢朓现存作品的四分之一,都是在宣城任上所作。南朝文士们足未涉黄河,身未登岱岳,没有机会领略广袤的中原山水、大漠风光,所以胸襟、眼界和情致都受到很大局限。

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唐代山水文学的宏大气象。有唐一代,特别是开元(713—741)、天宝(742—755)全盛之际,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国家政治相对清明,从而为文士漫游天下和写作山水诗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大一统的版图及四通八达的交通,不仅使文士有条件纵横于江源河尾,浪迹于天涯海角,而且还使他们浑身上下、诗文内外都洋溢着前代无法比拟与体验的青春活力与磅礴大气。那时的士人大都有过一段浪漫而惊险的漫游生涯。如陈子昂两度出塞,从西北走到东北,跨度万里,堪称初唐的大旅行家;孟浩然北上京洛,再寻吴越,东至大海,南下湘桂,西抵巴蜀,亦可算是当时的漫游大家。他如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



颇清狂”(《壮游》);岑参两赴边塞,鞍马风尘;玄奘法师出国境,周游西域与印度半岛达十七年方归等,皆为“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27页),远非六朝贵族文士所能比者。他们的人生阅历来源于大千世界,笔下诗文亦得力于“江山之助”。大唐社会上下漫溢出的自豪感、自信力、英雄气概、爱国主义与尚武精神同中华山水呈现出的旖旎风貌、雄浑气魄以及五彩缤纷、气象万千的神韵碰撞激荡,使大唐山水文学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秀美、瑰丽、壮阔和富贵。

两宋未能尽复汉唐故土,内忧外患严重;加之程朱理学兴起,使文人士子满腹忧患意识,满怀报国之志。文士的漫游活动(两宋之交更多是被迫南渡)及其付诸笔墨的山水文学自然没有唐代那样的豪迈潇洒、放浪形骸以及注重愉悦与享受。揆度宋代山水文学,抒忧国忧民之怀,重格物致知之旨、主明心见性之论是其特色。这之中,尤以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以及政治家兼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和南渡以后的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文士最突出。特别是朱熹关于“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五)的主张和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人文情怀以及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的别致眼光,极大地提升了华土诗性的品位,丰富了中华山水文学的内涵。这一时期的山水文学,除了颇为精致隽永的山水诗、山水文外,在题材上还增添了艳如春水秋叶的山水词以及林林总总的山水题记、题名、题额与楹联等。至于像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那样的山水笔记以及像沈括《梦溪笔谈》那样的地理著作,则是山水辞采与科学证实相结合的典范,反映出宋代文人思想内敛却求真务实的学风。

元、明、清三代,疆域辽阔而民族多样,理学渐固而皇权益重。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结束为分水岭,文士的漫游前期可以纵横四海,走向世界;后

期则止步于海内而顾影自怜。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在位期间,元朝在全国设置有一千五百多处水陆驿站,打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吸引了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西方许多知名旅行家纷至沓来。元朝士子亦翘首远极,群起西渐。大学者耶律楚材(契丹族)西行足迹远达黑色印度城(今印度北境)和可弗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咸海附近),行程近七万里,历时六年之久。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以七十二岁高龄率弟子十八人,应成吉思汗之邀,从山东莱州出发,由东向西穿越整个中国而抵八鲁湾(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西北麓),行程亦有万里之遥。当时又有中国景教徒巴琐玛(维吾尔族)西行远至大西洋东岸,赴法兰西造访巴黎大学,途中曾与同伴麻可斯一道,先后在巴格达担任景教总主教。元成宗以降,还有周达观、汪大渊驾船出海,访问东南亚与印度诸国。他们留下的山水诗与游记如《西游录》(耶律楚材)、《长春真人西游记》(李志常)、《真腊风土记》(周达观)、《岛夷志略》(汪大渊)等,寄慨山水,情挚意婉而笔触谨严翔实,反映了中国文人胸怀天下,渴望与世界交流的志向及锲而不舍、不断求索的精神。

郑和下西洋(随行的费信、马欢和巩珍留有三部游记叙其事)后,海禁渐兴。随着思想的内省、行为的内敛,中国文人又重新开启了向神州山水求学求知、寻情寻友的漫游潮流。其遍游天下而成果丰硕者当首推李时珍、徐霞客和王士性三人。李时珍一生踏遍大半个中国,行程数十万里。他耗时十年书就的一百九十万字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便是他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实证。徐霞客从二十二岁起即以身许山水,以一介布衣之力,穷极边荒,直至五十六岁辞世前一年,还未停止漫游天下的步伐。后人誉其为“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清·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称赞其《徐霞客游记》“当为古今游记之最”(《徐霞客传》)。早于徐霞客四十一年之王士性在地理学与山水文学的贡献上也不输于徐霞客。他每游必绘图并作诗,其《五岳游草》和《广志绎》尤具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



与王士性差不多同时的袁宏道(中郎)是晚明“性灵说”的倡导者。他与他的性灵派伙伴们“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将性灵注入山水小品中,使当时文坛为之风靡。明清之交的张岱说:“古人记山水乎,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在袁宏道的影响下,晚明文坛涌现出许多极富个性的山水散文作家,如袁宗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刘侗、祁彪佳、王思任、李流芳和张岱等。他们虽流派不同,风格各异,成就有别,但都在反复古、反道学思想的指引下,相继扛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大旗,努力从事山水小品的创作。其作品的特点是:不讲义理,不讲形式,清新流利,直抒胸臆,对以典雅雍容自美的传统“载道”文学形成极大的挑战。这是晚明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兴起,倡导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思潮在山水文学领域内的一种必然反映。

明末清初,朝代鼎革,一批漫游文士以遗民自居而坚守节操。他们在复国无望之后,遂退守林下,寓情山水,用如椽之笔既状摹如画江山,又宣泄心中块磊,词意或悲怆沉郁,或婉曲幽深,令人咏叹再三而不胜歆歔,如张岱的小品散文,顾炎武、黄宗羲的诗。甚至像钱谦益这样的贰臣,他笔下的山水诗文也同样传递出一种伤时之感、忧国之情,成为记录时代风云的别史。

随后的顺康诗人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查慎行、赵执信等被称为“国朝六大家”。他们的山水诗文亦刚亦柔,更多地表现独具个性的山水志趣,大都与故国情怀无涉。接踵而至的乾隆嘉庆诗人如沈德潜、厉鹗、袁枚、纪昀、赵翼、张问陶、洪亮吉等,则合力将清代山水文学推向高峰。顺治、康熙以来的文士不仅拥有登山临水、远足海内的体验,而且颇富文学创新精神;其状山描水不落窠臼,写景抒情自出机杼,从而改变了元、明山水诗不尽如人意的局面。他们擅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将诗歌进一步散文化、议论化,创造出远胜前代的大量长篇山水诗。如查慎行的《中秋夜洞庭湖对月歌》、蒋士铨的《开先瀑布》、姚鼐的《岁除日与子颖登日峰观日出作歌》、洪亮吉的

《天山歌》等,都是动辄数十韵乃至上百韵的山水诗的宏篇巨制。特别是作为性灵派主将的袁枚,以性灵之说审美山水、亲近山水,与自然山水灵犀相通,浑融一体,造就出一篇篇活泼鲜灵的山水美文与山水丽诗,如《游黄山记》《峡江寺飞泉亭记》《游黄龙山记》与《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观大龙湫作歌》《六言九章》等。

追溯古代文士漫游天下的行踪,纵览千百年来的山水文学长廊,其诗性、文风因时而异且与时俱进;其所描所写,皆得山水魂魄而物我浑一;其笔趣、墨意,则向着抒张个性与贴近现实开掘生发,从而使山水文学成为中华文化芳香可人的一株奇葩。而培育和滋润这株奇葩的,则是多姿多彩的中华山水与中国文人梦萦魂牵、生生不息的山水情结。



山水方滋

——山水文学的蔚然成宗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秦汉大一统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刀戈纷扰,兵燹不断,政权更迭,帝王兴替,就像走马灯似的,让后来的写史人、读史人看得目瞪口呆,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过,大动荡、大分裂未必是坏事。它不仅在政治与经济模式的演变、推进上带来一系列新气象,而且还在哲学思想与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推涌出一幕幕风流蕴藉、色彩缤纷的精彩大戏(如佛、道的崛起,玄学的风行,科学的兴盛,书法的嬗变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的觉醒(主要指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张扬)与“文学的自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最解放的,最自由的”(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从而为文学格局的变革及文学境界的提升输入了盎盎活力。它的显著标志之一便是山水文学的异军突起并蔚成大国。

套用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说,这一时期的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则发现了自然。(参见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特别是进入东晋以后,在士人群体中涌现出许多主动走向山水林壑,去热情触摸和感受大自然的背包客,如谢安、王羲之、孙统、许询、陶渊明、释慧远、谢灵运、谢朓等。他们或栉沐风雨,或醉卧烟霞,或踏雪野径,或坐对云山,在远离尘嚣之处去寻求心灵的宁静与自省。由此脱口而出的文字亦宛如